

中国文库

· 史学类 ·

# 辛亥革命史

(中)

章开沅 林增平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文库

史学类

# 辛亥革命史

(中)

主 编：章开沅 林增平

本卷主编：魏瀛涛 吴雁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 目 录

## 中 卷

第五章 同盟会的建立 .....	449
第一节 同盟会的筹建 .....	449
建立革命政党的迫切需要 .....	449
孙中山的组党活动 .....	455
同盟会的成立和发展 .....	466
第二节 同盟会的纲领 .....	473
民族主义 .....	473
民权主义 .....	481
民生主义 .....	485
第三节 同盟会的阶级基础和内部分歧 .....	494
阶级基础和政党性质 .....	494
同盟会内部的政治分野 .....	498
光复会的分裂活动和共进会的成立 .....	509
第六章 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	534

第一节 民主共和方案战胜了君主立宪方案	
.....	534
大辩论的新阶段.....	534
革命派同改良派的激烈交锋 .....	541
论战中革命派的局限和赢得的胜利 .....	558
第二节 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同天命论、君权 神授论的斗争 .....	564
顽固派、改良派乞灵于旧学 .....	564
革命派对旧学的批判 .....	569
思想武器的软弱无力 .....	582
第三节 国粹主义思潮 .....	586
国粹主义思潮的兴起 .....	586
国粹派宣传的主要内容 .....	593
对国粹主义的评价 .....	605
第四节 无政府主义思潮 .....	612
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 .....	612
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流派 .....	615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 .....	626
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评价 .....	629
第七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起义和群众 自发斗争 .....	650
第一节 从萍浏醴之役到 1908 年的各次起义 .....	650

革命党人武装斗争的方略 .....	650
萍浏醴起义 .....	654
潮惠钦廉起义到河口之役 .....	665
光复会发动的皖浙起义 .....	677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联系 .....	684
第二节 新军起义和黄花岗之役 .....	693
安庆马炮营起义 .....	693
广州新军起义 .....	695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新军中工作的开展 .....	698
黄花岗起义 .....	705
革命党人的军事冒险主义 .....	714
第三节 群众自发斗争的急剧高涨 .....	719
清王朝的暴政 .....	719
抗粮抗租和抢米风潮 .....	722
抗捐抗税斗争 .....	730
秘密社的起事 .....	732
反洋教斗争 .....	742
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 .....	755
革命在全国更普遍地发展 .....	759
第八章 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 .....	780
第一节 清廷预备立宪和官制改革 .....	780
立宪的酝酿 .....	780
五大臣出洋 .....	784

名为立宪实则集权的官制改革 .....	792
第二节 逐渐扩大的立宪运动 .....	796
立宪派声势的膨胀 .....	796
立宪团体的兴起 .....	802
立宪请愿的发动 .....	806
第三节 宪政的筹办和国会请愿 .....	810
《钦定宪法大纲》和皇室亲贵集权 .....	810
各省谘议局的成立 .....	814
第一、二次国会请愿 .....	819
资政院的召开和第三次国会请愿 .....	823
第四节 皇族内阁的建立和立宪派人的 新动向 .....	828
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 .....	828
立宪政党的建立和立宪派的分化 .....	832
立宪新政的彻底破产 .....	840
第九章 保路风潮 .....	860
第一节 收回利权运动 .....	860
商办铁路的兴起 .....	860
收回路权的斗争 .....	866
收回矿权的斗争 .....	873
收回利权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	877
第二节 保路运动的蓬勃发展 .....	883
铁道国有政策的出笼 .....	883

湘鄂粤川的保路运动 .....	888
保路运动的内部斗争 .....	894
第三节 保路同志军起义 .....	903
成都血案 .....	903
保路同志军起义 .....	907
“引起中华革命先” .....	915

## 第五章 同盟会的建立

### 第一节 同盟会的筹建

#### 建立革命政党的迫切需要

同盟会建立在1905年,是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的。

20世纪初年,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在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仍然是亟待实现的历史任务。和中国革命相互伴随、彼此呼应的,在西亚有伊朗和土耳其的革命运动,在南亚有印度的反英斗争,在东南亚有菲律宾、越南、泰国、印尼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东北亚有朝鲜人民的反抗斗争。正如列宁所曾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sup>①</sup>

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不管其发动的程度如何,采取何种形式,都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特别是反对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争夺亚洲以至整个世界的霸权的意义,也都属于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范畴。共同的历史使命和相似的民族境遇,使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在革命极其艰难的岁月里,孙中山等奔走在海外,不断得到菲律宾、越南、泰国、印尼等爱国志士和革命人民的热情帮助。同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很关心朝鲜、越南、印度、印尼、泰国等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们



不仅在一些国家扩大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还以实际行动支援过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孙中山就曾多次为菲律宾爱国志士代购军火,并曾打算率领兴中会员参加菲律宾抗美斗争,然后借助菲律宾人民的援助,回中国内地发动武装起义。<sup>②</sup>章太炎以后也曾热情宣传印度的反英斗争,主张中、印人民“抱持而起”,“屏蔽亚洲”,把西方侵略者赶出去,帮助其他被压迫国家求得独立。<sup>③</sup>

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年代里,孙中山曾经说过:“远东各国的问题……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情况确实如此。亚洲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革命任务,都存在着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都渴望着求得独立自主和发展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在好些国家,包括伊朗、印度、越南、中国等,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共同特点,如资产阶级内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两条路线斗争,革命人民反对统治阶级假立宪阴谋的斗争,等等。正是这样许多共同特点,促使亚洲革命人民不满足于个别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援,积极寻求更大范围的国际性的革命联合。尽管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存在着明显的历史的与阶级的局限,但毕竟说明亚洲各被压迫民族多数已经结束了旧式的自发的反帝斗争阶段,相率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面临着一场崭新的斗争,面临着领域更为广阔的国际性合作,像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那样一些带有狭隘地域性的小团体,自然不再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于是,建立全国性政党的任务,就提上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议事日程。

列宁说:“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的战争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sup>④</sup>同盟会的成立,正是导向中国革命这一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事变的契机。

同盟会正式建立于1905年夏天,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国内

社会基本矛盾激化所必然反映的动向,是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产物。

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革命潮流的低落是很短暂的。不过一两年光景,冀中、冀南和四川的“扫清灭洋”、“灭清、剿洋、兴汉”的群众斗争再次狂飙突起,东北人民的抗俄斗争气壮河山,西藏军民奋起反抗英国的武装侵略,同仇敌忾,声威远播。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群众斗争更加蓬勃发展,特别是广西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省,预示着全国范围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先进的人们具有澄清宇内、运筹全局的才识和胆略。但是,由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先后失败,农民起义的领袖和骨干已经受到严重的摧残;而且基于阶级的局限,他们除了“扫清灭洋”、“反清复明”等旧式的朴素的战斗口号以外,再提不出新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需要有新的社会力量来领导新的革命斗争。

阶级斗争发展的水平,归根到底要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矛盾发展程度的制约。确切地说,甲午中日战前,幼弱的民族资本主义仅仅是在个别经济部门零星出现,虽然不失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但它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还不能说是非常尖锐。而甲午战后,特别是1905年前后,在历次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推动下,民族资本主义不仅是在资本总额方面成倍地增加,而且在缫丝、纺织、面粉、榨油、碾米、卷烟、火柴、皂烛以至许多手工业部门逐步延展。这个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尽管仍然很不成熟,但是毕竟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在国民经济当中开始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随着经济力量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增长。如同本书第一章所提及,戊戌变法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来推行温和的改良主义政治方案。而到了20世纪初年,民族资产阶级就已经比较明确地形成了独立的阶级意

识和阶级要求。

1905年前后,资产阶级人们在一些报刊上吐露了自身的社会职责和愿望。他们把自己所从事的实业(有时概称为商务)赞颂为导致国家富强的盛事,把自身比作社会的中坚。《商务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之安危系之,故致强之道,务在兴商。”“当知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sup>⑤</sup>有人指出:“实业之效,在一家则生活之途宽,在一邑则游惰之人稀,在一省则岁入之款饶,在天下国家则并可以转弱为强,化贫为富。”<sup>⑥</sup>有的则对置身实业界的人们倍加推崇,期望他们“当知一己所操,内之有以贍家,外之有以内国,实生人最贵之业,更无所慕于为官作吏,钟鸣鼎食,大纛高轩……言其功效,比隆禹、稷,岂过也哉!”<sup>⑦</sup>这里,资产阶级可以说是已经把以往封建士大夫沾沾自许的“修齐治平”的使命,挪到了自己的肩上,显露了他们行将取代封建地主阶级的自信。上海《南方报》的一篇文章,更为资产阶级所要实现的任务大造舆论,它指出:“商战以实业为最重,国家之所以强盛,人民之所以乐利,胥赖乎此。而亡人国,墟人社,致人死命,于今世纪中,又无不以握其经济机关,为各国注意之要点。……故我国今日苟不欲立国于世界则已,如欲为自立计,则断非振兴实业不可。然实业最要之关键:一在经济流通;二在商团坚定;三在商力雄厚。”<sup>⑧</sup>这篇文章对“最要之关键”的阐述,实际上是提出了开拓一个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建立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里有足够权威的资产阶级社团的要求。

伴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求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在政治上,他们呼吁一个统一的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的愿望也日益显露。这类集结政治力量的意愿,在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言行中,已有了明确的反映。《浙江潮》第3期刊登了一封国内读者来信,针对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同乡会林立和各自为政的现象,这位读者主张消除地域界限,联合建立统一的团体,并且要求

“人人心忧国之心，人人事忧国之事”；“但有国界，不有省界”。《浙江潮》的编者热情支持这位读者的倡议，特地发表一篇题为《非省界》的署名文章，痛陈“省界”的严重危害，主张建立一个由各省“发达之分子”组成的“中国本部统一会”，作为“中央机关”，领导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另一个进步刊物《江苏》，则认为要结大群，必先集小群以为联结，只要“各省竞以爱其省者爱中国，驯致齐心一致，以集注于爱国之一点”，那么中国的兴旺就是必然的了。<sup>⑨</sup>此外《汉声》杂志也认为：“由小群而进为大群，此今强国之所以优胜也。”并且主张“由此而联为一最大之团体”。<sup>⑩</sup>这种认识是先进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对“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湖北者，湖北学生演其输入文明之舞台也”之类地域观念的一大突破。

事实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日益增长的民族觉醒，早已促使各省进步知识分子逐步走上联合的道路。有些爱国的或革命的团体，从一开始就突破了“省界”，如励志会、中国教育会、军国民教育会等等。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甚至公开提出“合做一个大党”的主张。他说：“从前只有守旧求新二党，到了晚近，即求新一党，又分出许多党来。有主张革命的，有主张勤王的，有主张急进的，有主张和平的，有主张陆军的，有主张科学的，比那从前两大党的争竞还激烈一些。……此外又有私立的党会，算来不下数千百起，都不相联络，此处起事，彼处旁观，甚或彼此相仇，也是有的。……不如大家合做一个大党，凡是我汉族的人，无论是为士为农为工为商，都不可丝毫扰害，都要极力保护，不使一个受外族的欺凌，方可对得祖宗住，岂不是大豪杰所做的事吗？”<sup>⑪</sup>当然，他所说的“大党”更近乎反帝爱国联合战线，指的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而且还错误地否认各派力量在政治上存在着原则分歧。但是，要求把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毕竟是陈天华“合做大党”思想的主体。1903年6月，《苏报》在刊载《客民篇》一文以后，发表评论说：人民“必先认明主人之位置，扩充主人之能力，而

后享有主人之特权”。决不能把国家归之欺凌人民的清朝政府，必须“归之胶黏集合同胞一体之民党”。<sup>⑭</sup>这就更加接近于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明确主张。值得注意的是，革命知识分子已经提出要以“同盟会”作为将要建立的“大团体”的名称。1903年5月出版的《湖北学生界》第5期，在封底便刊登了“大湖南北同盟会”的书刊广告。同时，邹容在上海筹划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打算首先在学生中间组织一个“绝大合法团体”，效法“俄罗斯学生之风潮披靡全国”，并且在各省府县分别设立总部和分部，向清朝专制政府争取民主权利，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斗争。<sup>⑮</sup>安徽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会，则打算进一步创建“国民同盟会”，作为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sup>⑯</sup>甚至连清朝政府直接控制的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提出了“发大志愿，结大团体”的主张。<sup>⑰</sup>这些情况都充分表明，联合斗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建立一个作为革命中心的资产阶级政党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了。

从主观方面来说，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条件也基本具备。除了孙中山和兴中会其他成员一直坚持革命的宣传组织活动以外，国内在1904年前后成立了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东京留学生中间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小团体。<sup>⑱</sup>这些革命团体不仅积极开展宣传组织活动，而且大多进行了武装起义的尝试，因而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骨干方面为建立全国性政党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到了1905年上半年，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的一些领导人和骨干分子，由于长沙起义失败和万福华刺王之春案件的牵连，相继逃避到日本。他们绝大多数集中在东京，继续鼓吹革命，联络同志，“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sup>⑲</sup>《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创刊，就寓有联合全国革命志士和建立革命中心的深意。但是，由于“各派势均力敌，未能集中力量，合组一大团体，以与清廷抗衡，识者憾焉”。<sup>⑳</sup>情况很清楚，需要有一个最孚众望的革命领袖出面，才能及时把各个团体的领导骨干团聚起来，以实现筹建全国性的革命政党的共同心愿。

## 孙中山的组党活动

列宁曾经说过：“‘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sup>①</sup>这样的思想家，在当时的中国，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个就是孙中山。正是他，比其他人更为妥当地解决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课题。

孙中山流亡海外，心向祖国，密切注视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不断探索着革命前进的道路。从兴中会创立到惠州起义失败，六年的时光已经流逝，但是革命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这是什么缘故？起初，孙中山曾经片面地归咎于缺少军火，认为只要“获得相当数量的军器武装起来并尽力准备，就能很容易把清朝军队击溃”。<sup>②</sup>但是，经过对客观实际的分析研究，他终于纠正了这种错误的认识。1903年前后，孙中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1）单纯从事军事活动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大击保皇毒焰”，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使人人知所适从”。<sup>③</sup>（2）从组织方面来说，“分道扬镳，终不如集中力量，事较易济”，需要“招集同志，合成大团”，<sup>④</sup>为全国革命运动提供一个比较健全的领导核心。因此，这些年，他一方面以凌厉的攻势，尖锐地批判了保皇派的君主立宪主义，从政治思想上为革命发展扫清障碍；一方面在斗争中广泛结纳革命志士，为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积极做好准备。

要解决好这个新的课题，是单纯以兴中会为基础，把它改组成为全国性政党？还是联合其他革命团体，共同组成全国性革命政党？孙中山的言行表明他是倾向于后者。

当时，曾经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兴中会已经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原因是：（1）兴中会的社会基础不够广泛，主要限于香港和海外华侨的中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会党，知识分子所占比重很小；而且会员绝大部分都属于广东省籍，其中香山县人又占一半

以上。<sup>③</sup>这种显然带有狭隘地域性的秘密小团体,不可能承担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历史使命。(2)兴中会虽已成立多年,但孙中山等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筹款和策划起义,顾不上团体内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所以不少会员的政治思想相当模糊。就以孙中山首创的檀香山兴中会来说,其中虽有少数坚定的革命者跟随孙中山回国从事武装起义,但其领导权却落在几个当地华侨资本家的头面人物手里。这些人本来就缺乏明确的革命思想,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特别重要,因而使兴中会更加削弱了战斗力。

正是基于上述弱点,兴中会便不能有效地抵挡保皇派的欺骗和破坏。如檀香山的华侨大半被骗入保皇会,原来的兴中会几乎被弄得全军覆没。横滨的兴中会员,也由于保皇派的煽惑,“率已脱入保皇党,孙文唯借张能之、温秉臣、尤烈、廖翼朋等数人,设中和堂于横滨,甚势甚微”。<sup>④</sup>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源地,横滨是孙中山在日本的活动据点,这两个地方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如香港、台湾、越南、南非等地兴中会的零落不堪也就更加可想而知。

同时,兴中会的主要领导骨干的相继牺牲和内部的严重分裂,也使这个小团体很难进一步单独发展成为全国性政党。被称为“吾党健将”的陆皓东,是孙中山早期的得力助手,不幸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时被捕牺牲。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孙中山的另一得力助手史坚如又不幸被擒遇害。多年以后孙中山还为这两个人过早遇难而惋惜不已:“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土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sup>⑤</sup>而兴中会领导骨干中活动力最强的郑士良,也于1901年因食物中毒暴卒。剩下来的除陈少白还略长于文字宣传以外,尤烈、杨鹤龄等人也都缺乏必要的领导才能,论人才,反而不及国内几个革命团体那样群英毕集,济济一时。再加上香港兴中会总部中本来就有辅仁文社成员的自成系统,他们显然始终只尊重杨衢云、谢纘泰的领导。惠州起义失败后,杨衢云被敌人暗杀,孙中山极为痛愤,曾在日本为之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且募捐2000余元抚卹其

家属。但是仍然不能弥合两派的裂痕,谢纘泰依旧独行其是,连联合洪全福再次策划广州起义这样的大事都不与兴中会总部通气。这些情况,当然也会影响孙中山对于兴中会发展前途的信心。

但是,挫折并没有使孙中山灰心丧气,他仍然精力充沛地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间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不过,这些活动的主要着眼点并非恢复和发展兴中会,而是努力建立一个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更明确的政治纲领的近代革命政党。

有的史书记载:从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孙中山“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sup>⑤</sup>这种说法是可信的。1902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广泛结交中国留学生,但对于来访的进步青年,并没有劝他们加入兴中会。<sup>⑥</sup>这年冬天,孙中山前往河内,结识爱国侨胞黄隆生等数人,重新建立了革命组织。有人说这就是兴中会分会,但实际上打的却是致公堂旗号,<sup>⑦</sup>至少并不意味着孙中山急于重建和发展兴中会这个老革命团体。至于孙中山1903年8月在东京青山创建革命军事学校,1904年1月在火奴鲁鲁创立中华革命军,以后又在美洲致力于改组致公堂,都采用了与同盟会一样的十六字宗旨作为誓词,并一律“未用兴中会字样”。<sup>⑧</sup>1904年底至1905年春,孙中山在欧洲留学生中间建立革命团体,也用的是同样十六字誓词,并且根本不提兴中会的名字。<sup>⑨</sup>

上述种种情况,都说明孙中山正在孕育着一个建立新党的计划。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他不仅为同盟会的建立在思想战线上扫除了障碍,提供了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联系和培养了一批骨干,而且还通过改组致公堂,在欧洲创建革命团体等实践,初步摸索出一套组党经验。他所提出的“合成大团”的正确主张,完全符合他所隶属的那个阶级的意愿。阶级需要政党,政党需要领袖,而领袖是在长期斗争中被群众识别和选择出来的。孙中山之所以能够成为同盟会的缔造者和革命领袖,绝不是偶然的。

列宁曾经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



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sup>④</sup>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一批可以成为并且正在成为革命领袖的人物，如黄兴、宋教仁、刘静庵等，而孙中山则更具备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的必要素质。

正是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他在1903年提出的十六字誓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思想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只要对照一下其他革命团体的纲领或口号，如华兴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科学补习所的“革命排满”；光复会的“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等等，便可以看出，孙中山比他在中国的同代人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他不仅看到广东、港澳，而且看到整个中国，看到亚洲以至全世界。他不仅想到当前的民族民主革命课题，而且想到革命以后怎样使中国臻于富强，想到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必然产生的“弊病”。由于他具有这样广阔的政治视野，所以使人“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

正是他，在近代中国最先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征途。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最早提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纲领，并且为实现这个纲领多次领导武装夺权的英勇斗争。他不畏强暴，不怕挫折，以惊人的毅力经受一次又一次失败的考验而不屈不挠。他最先也最深切地察觉保皇派对革命的严重危害，立即挺身而出，“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表现出可贵的革命战斗精神。与其他革命团体的领导人相比较，他对保皇派的斗争显得更为坚决彻底，因而便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在群众中享有更高的威信。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欧洲早期资产阶级中具有“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sup>⑤</sup>的伟大人物那样，孙中山从自己的政治生涯的开始便投身于时代的运动，不仅用舌和笔而且用枪和剑向帝国主义的走狗